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主编

# 中国佛教与禅宗

纪华传 著



宗敎文化出版社

宝庆讲寺丛书

中国佛教学者文集

主编 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  
副主编 圣凯 道坚 黄夏年



# 中国佛教与禅宗

纪华传 著

◎ 宗教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佛教与禅宗/纪华传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5  
(宝庆讲寺丛书·中国佛教学者文集/朗宇法师 清修法师主编)  
ISBN 978-7-80254-016-3  
I. 中… II. 纪… III. 禅宗-佛教史-中国 IV. B9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073568 号

---

中国佛教与禅宗

纪华传 著

---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95213(编辑部)

策划组稿: 黄夏年

责任编辑: 戴晨京 朱宇杰

版式设计: 陶 静

印 刷: 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5 印张 280 千字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80254-016-3

定 价: 38.00 元

---

## 总 序

从佛法本身来说，教、理、行、证的修学次第，已经为佛弟子指明了修学的道路。但是，佛弟子因为自己的资质、喜好的不同，往往有所偏向，于是形成不同类型的佛法，有重义理、重实践等区别。但是，作为佛弟子来说，义理的探讨是为了将佛陀所要开示的真实事理，充分、完整地表达出来，如“阿毗达摩”虽然着重于论证“法”的自性、定义、关系等，但是其本意仍然在于“谛理的现观”，最终归于修证。那么，重修证的佛教，主要是从利益众生的角度，重视佛法的适应性、实效性，所以对事相的分别比较少，如初期大乘经典以“般若”、“三昧”、“解脱门”、“陀罗尼”、“菩提心”等作为中心，来表达从发趣、修行到证入的历程。虽然存在着种种不同的侧重，但都是佛法的根本，都是以义理知识与实践经验相结合为中心。中国佛教其实已经非常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如天台智者大师的教观并重，这是中国佛教的优良传统。《高僧传》将古代僧人分为十科，其中翻译、解义、读诵便属于义解门；而习





禅、明律、感通、遗身、护法、兴福，都是属于实践门；最后一科“杂科”则是指出家人的外学修养，旁及世间经书、治世语言、礼乐文章等，无不兼通。

但是，传统意义的佛教义解，主要是注疏经、律、论，在“述而不作”中表达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当然也有一些专门性的著作。而且，这些佛教义解僧，都是从自己的信仰与经验出发，通过注疏、论著，来达到实践与弘法的目的。南北朝佛教的兴盛、隋唐佛教的辉煌，都与义解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而禅宗的发展则为中国佛教注入新的生命，重视主体的体认、自己身心的解脱，净土法门的流行，激发了信仰佛教的感情，为佛教走入社会提供了方便。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随着禅、净的流行，在这种“简单”、“不立文字”的潮流下，中国佛教徒逐渐失去探讨高深佛理、考察繁琐戒律的兴趣。于是，中国佛教重视义理研究的优良传统便丧失殆尽。

另一方面，佛学研究在佛教界之外却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应该是开始于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殖民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必须要深入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于是，通过接触梵文、巴利文等东方语言，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消化佛教的教义。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学者注重现代佛学研究的客

观性、纯学术性,形成了佛学研究的现代传统,于是佛教便成为一种学问——佛学。19世纪后期,日本佛教界开始运用西方的学术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日本佛学研究的兴盛与发达。随着“西学东渐”、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的影响增强,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意义上的佛学研究,这在当时中国佛教界引起很大的反响与回应,如《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的辨伪,“大乘佛教非佛说”的讨论,“佛教非宗教非哲学”之辩等。同时,佛教界受时代流行的学术方法的影响,尤其是以太虚大师为首的“人生佛教”运动,佛教理性主义思想的高扬都直接推动了佛教界从事佛学研究,其中以印顺法师的成就最大。但是,相对来说,学术界则在佛学研究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像吕澂、陈垣、汤用彤等,皆为一代学术大师。

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佛教界基本上完成了修复寺院、重塑佛像的工作,寺院呈现出游人如织、香火旺盛的现象。于是,培养人才、弘法、学术研究等工作提到首要位置。然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各方面人才的紧缺无形中遏制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而人才的成长与培养,这又与佛教界的观念与重视程度是成正比的。

近代佛教学术研究的发展,由于受到欧美治学风





气的影响,文献学、考据学、思想史、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被大量地使用,对佛教进行理性地分析,定性定量,促使人们对佛教认识更加深入。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剖析佛教的历史与思想等等领域,扩大了佛教的知识面,更凸显了佛教的悠久历史和文化积淀。学术研究利用各种先进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各种文献的比较研究,不断挖掘利用新出土的资料,显示其优胜之处。通过学术研究,使佛教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发展脉络更加清楚,提高了人们对佛法的正确认识。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学者本身就是社会的精英,对社会了解非常透彻,其思想观点往往能够补充僧界的不足;同时,他们作为佛教界与社会沟通的桥梁,圆融转化佛教的思想,向社会表达佛教的看法,这些都是有益于社会与众生的活动。

因此,佛教学术研究的根本意义,不仅是了解存在于一定时空中的佛教发展形态,而且更是从现存的文献、文物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探索其前后延续,彼此关联的因果性;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到佛法的本质,及其因时、因地的适应。以了解过去,承受根本的佛法特质,作为我们信行的基础,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代表大会便提出要契理契机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以文化阐扬佛法,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契理契机地以文化阐扬佛法是实现佛教中国化、本土化、现代化的权巧方便。”现代中国佛教界,应该认真地认识学者们的新观点,吸收其中的有用之处,通过转化与变通,仍然能够落实到佛法的信仰与实践,佛教才具有更大的潜力。

宁波宝庆寺始建于北宋端拱二年(989),至今已有千余年的历史。嘉定十五年(1222)宋宁宗赐名“宝庆讲寺”。寺里历代住持及僧众均有重视义理、尊重学术、礼待学人的优良传统,一直讲法不辍。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现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世界性启蒙教材《三字经》的作者王应麟曾为宝庆寺撰写了《宝庆讲寺记》。大儒黄震为寺里撰写了《宝庆寺观音殿记》。此二文的碑刻至今仍然保存完好,高高地耸立在寺里。现在宝庆全寺僧众十分重视自身素质的提高,在日常事务、早晚功课、坐禅念佛等之外,勤于读书,研究经论。我本人自从出家以来,参访名山大寺,受到多位高僧大德善知识的指点,喜欢研读经论及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因此无论到哪里,我都会带上一些书,也经常会到各地的书店去逛逛,看到佛教书籍经过十多年的出版,蔚为大观,感到欣慰。但是,对于社会的需求和佛教文化的发展,目前出版的书籍远远无法满足人们对佛法的需求,而且现有书籍之中,难免良莠不齐,精品佛教图书仍然少见。有







感于此,我和道坚法师、圣凯法师、黄夏年先生进行一些交流,得到他们的赞同与支持。于是,我们决定以本寺的名义出版一套丛书,希望能够推进佛学研究的发展,让佛法能够深入社会人心,达到净化人生的效果。

朗 宇

2004年6月21日于宁波宝庆讲寺

# 目 录

总 序 .....	朗 宇(1)
菩提达摩碑文考释 .....	(1)
马祖“即心即佛”说的思想渊源及禅法特色 .....	(26)
明本的看话禅与工夫论 .....	(45)
明本的禅净融合与禅教会通思想 .....	(89)
少林寺禅学的源流发展与展望 .....	(114)
玄鉴与元代云南禅宗 .....	(128)
永觉元贤《鼓山志》及其文献价值 .....	(153)
三论宗吉藏的二谛思想 .....	(180)
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略析 .....	(228)
元初的崇教抑禅政策与江南禅宗 .....	(241)
赵孟頫与中峰明本的佛学因缘 .....	(258)
李贽佛学思想初探 .....	(289)
略论清代净土信仰与普贤菩萨 .....	(301)





20 世纪以来的清代汉传佛教研究 .....	(314)
慈航法师与南洋佛教 .....	(339)
日本人元求法禅僧与幻住派 .....	(348)
从生命的体验到哲学的探索 .....	(366)
——谈西田几多郎《善的研究》与佛学	
中国大乘佛教传统与人间佛教实践 .....	(377)
——以慈善事业为中心	
人间佛教与全球伦理 .....	(394)
佛教慈善事业与社会建设 .....	(405)

# 菩提达摩碑文考释

## 一、前 言

菩提达摩碑文署名为梁武帝撰述,从上个世纪 30 年代以来,此碑陆续在河北磁县的二祖山元符寺、河南的少林寺和熊耳山等处被发现,这三块碑除个别字句有所差异之外,内容基本一致。达摩碑文文笔优美,思想精微,对达摩的禅法和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颂,对于达摩的去世以及埋葬之处等所记甚详,是一篇比较成熟的禅宗文献。达摩碑文在历史上出现得较早,流传也很广。神会(684-758)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略称《杂征义》)和杜朏的《历代法宝记》都明确记载过梁武帝造达摩碑文,金藏本《宝林传》卷八(《宋藏遗珍》第二册)完整收录了此碑文,唐代澄观(738-839)《大方广佛华严经随疏演义钞》(略称《演义钞》)、宗密(780-841)《圆觉经大疏抄》、北宋延寿(904-975)《宗镜录》以及契嵩(1007-1072)《传法正宗记》等著作都引用过此碑文的部分内容。此外,日本光定的《传述一心戒文》、日本最澄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驹泽大学图书馆藏《景德传灯抄录》等著作中也都曾经引用过碑文的文字。由此可见,达摩碑文在历史上曾经产生过





较大的影响。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达摩碑文一直被视为伪作,所以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但即使是伪作,也有其产生的时代,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禅宗的实际情况。陈垣《释氏疑年录》曾提到过河北磁县出土的达摩碑:“其文体亦不类梁时风格,当是中唐人假托。”<sup>①</sup> 陈垣的论断非常重要,可惜未展开论证。温玉成首次在河南陕县找到了菩提达摩的葬地——熊耳山空相寺,他的《传为达摩葬地的熊耳山空相寺勘察记》一文,对于空相寺的历史沿革、塔碑遗迹等作了考证,是迄今所见的最早介绍熊耳山达摩碑文的文章,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sup>②</sup> 日本学者小岛岱山曾在《中外日报》和《朝日新闻》对熊耳山碑文作过报道,后来在《世界宗教研究》上发表了《菩提达摩石碑碑文并参考资料》一文,把从中国各地收集到的菩提达摩碑文的石碑资料以及有关参考资料,一起公之于世,对于达摩碑文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小岛岱山的介绍,日本学者石井公成开始关注达摩碑文,相继发表了《梁武帝撰〈菩提达摩碑文〉的再检讨》(一、二)两篇论文,这是关于达摩碑文最新的重要研究成果。<sup>③</sup> 不过,石井公成的研究,由于资料的

① 陈垣:《释氏疑年录》卷2,中华书局,1964年,第38页。

② 《中国文物报》,1994年11月13日。另外,可参见温玉成:《少林访古》,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③ 小岛岱山的论文《菩提达摩石碑碑文并参考资料》发表在《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1期,此前又曾在日本的《中外日报》(1999年9月11日)和《朝日新闻》(1999年9月10日朝刊)作过介绍和报道。石井公成的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驹泽短期大学研究纪要》第28号,2000年3月;《驹泽短期大学佛教论集》第6号,2000年10月。本文的写作参考了上述资料及研究成果。



限制,仅看到熊耳山达摩碑文的开头部分,因此,有必要利用小岳山公布的新资料,对达摩碑文重新进行考察。

本文结合传世的佛教文献、早期禅宗的敦煌文献以及地方史志、寺志和碑刻等资料,对于菩提达摩碑文的诸本比较、撰述时代和历史价值等方面做了全面的研究。

## 二、达摩碑文的刻建及流传

### (一)达摩碑文的刻建

从现存的佛教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来看,达摩碑文至少刻建过四次,除已发现的三块碑之外,最早在少林寺还曾立过此碑。据神会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中的记载“梁武帝造碑文,见在少林寺”,时间应该在732年之前,详见下文的考证。然而此碑后来的流传情况却不得而知,现在于少林寺所发现的达摩碑是在元代重建的,本文所说的少林寺达摩碑若不加说明都是指元代重建的达摩碑。

熊耳山的碑在空相寺(或称空厢寺),该寺原名定林寺,俗称西山寺,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县李村乡境内。《大清一统志》卷二〇五“河南府”记载:“熊耳山,在宜阳县东,接永宁县界。”空相寺现存的重要遗迹有:达摩遗塔一座,即建于唐大中七年(853)的“圆觉塔”;菩提达摩碑,即署名梁武帝所撰写的《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以及达摩造像碑等。关于熊耳山的达摩碑文,未见有历史记载。根据达摩碑文的记载,达摩是在梁大同二年(536)十二月五日去世,熊耳山是达摩去世后埋葬之



处,熊耳山达摩碑文落款是:“梁大同二年岁次丙辰十二月十五日,发心弟子洪远施石,并合山同立。”

二祖山元符寺,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成安县的二祖村,历史上隶属彰德府磁州。据《磁县县志》记载:“(元符寺)在县东北五十里二祖村,唐贞观十六年建,相传为二祖圆寂之所。”<sup>①</sup>元符寺的达摩碑是唐代后期李朝正等于元和十二年(817)重建的,碑文于1935年出土。二祖山元符寺的达摩碑落款是:“大唐元和十二年五月十二日,昭义军监军使兴元元从登仕郎守内侍省奚官局令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紫金鱼袋李朝正重建。”<sup>②</sup>

少林寺,位于登封县城西北13公里少室山北麓五乳峰下。少林寺的碑文是重建于元至正七年(1347)。据洪亮吉、陆继萼撰《登封县志》卷三十《元达摩大师碑》记载:“《金石考》:欧阳元(玄)撰,唐里巛书,赵世安撰。”欧阳玄(1274-1358)曾叙建碑的因缘:“维昔达磨大师掩室龙门,藏舟熊耳,时君萧梁武帝追述慧命,亲制穹碑,时代推迁,旧刻既泐,遗文仅在。皇元至元三年己卯,少林长老息菴,将凿石洛汭,树表禅源,遣徒至京,希旨今朝,求证当世,太皇太后命臣叙事载惟。”<sup>③</sup>

那么,这些碑文是如何产生的呢?从熊耳山、二祖山、少林寺三块碑落款来看,似乎熊耳山的碑是第一块。所以日本

① 黄希文等纂:《磁县县志》第5章第3节,第76页。

② 《全唐文》卷998。

③ 清叶封:《少林寺志·碑记》,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7年,第114-115



学者镰田茂雄认为熊耳山的达摩碑是“真正的原石原碑”，小岛岱山也认为熊耳山的达摩碑文是梁武帝所亲撰，并且特别强调了熊耳山碑文的价值。<sup>①</sup>那么，碑文是否是梁武帝撰写的呢？笔者认为碑文不可能为梁武帝所撰，理由如下：第一，从此碑的记载来看是达摩去世10日后所立，这显然无法成立，从达摩去世，要报知梁武帝，然后撰述碑文，再千里迢迢到熊耳山刻碑，仅用10天时间根本不可能。第二，梁武帝这一称号是死后所追尊的，据《梁书》记载，萧衍于太清三年（549）四月去世，“冬十一月，追尊为武皇帝，庙曰高祖。”<sup>②</sup>而碑文明确署名为“梁武帝撰”，显然与史实不符。第三，从碑文落款所写的“发心”、“施石”等文字来看，堂堂的梁朝皇帝撰写的碑文，竟然还要不见经传的佛门弟子发心做功德布施碑石，更是难以置信。所以，由此可以判定此碑的立碑时间是假的，不可能是原石原碑。此外，温玉成通过实地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在《传为达摩葬地的熊耳山空厢寺勘察记》一文中认为：“《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约作于明万历年间，该碑显系利用宋金旧碑重刊。”<sup>③</sup>所以，熊耳山的碑不是“真正的原石原碑”，达摩碑文也不可能是梁武帝所撰写的。

## （二）各种达摩碑文的比较

除了二祖寺、少林寺、熊耳山等地发现过达摩碑之外，《宝

① [日本]《朝日新闻》，1999年9月10日朝刊。

② 《梁书》卷3，《武帝本纪》。

③ 《中国文物报》，1994年11月13日。温玉成的《少林访古》一书又对这一观点作了修正，认为：“从形制上看，应是金、元之作。”



林传》中也完整收录了此碑文的内容。下面,笔者从现存的四种碑文中选取了12处有差异的文字列表如下:

	熊耳山	二祖山	少林寺	《宝林传》
1	我闻:沧海之内,有骊龙珠白毫色,天莫见,人不识,我大师得之矣。	□□□□□□ □□龙珠白毫色,天莫见,人不识,则我大师得之矣。	我闻:沧海之内,有骊龙珠白毫色,天莫见,人不识,我大师得之矣。	我闻:沧海之内,有骊龙珠白毫色,中现楞伽月,唯我大师得之矣。
2	为玉鬘久灰,金言未普,暂传师化,天竺东来,杖锡于秦。	为玉鬘久灰,金言未普,暂传法化,天竺东来,杖锡于秦。	为玉鬘久灰,金言未普,暂传师化,天竺东来,杖锡于秦。	为玉鬘久灰,金言未剖,暂传法化,天竺东来,杖锡于秦。
3	尔其育物也,澍无雨雨,洒润身田;说无法法,证开明理。	示其育物也,注无雨雨,洒润身田;说无法法,证开明理。	尔其育物也,注无雨雨,洒润身田。说无法法,证开明理。	是其育物也,澍无澍之法雨,洒润身田;说无说之心灯,证开明理。
4	实哉空哉,凡哉圣哉!心无也刹那而登妙觉,心有也旷劫而滞凡夫。	实哉空哉,凡哉圣哉!心无也刹那而登妙觉,心有也旷劫而滞凡夫。	实哉凡哉,空哉圣哉!心无也刹那而登妙觉,心有也旷劫而滞凡夫。	实哉空哉,凡哉圣哉!心无也刹那而登妙觉,心有也旷劫而滞凡夫。
5	使长流法海,洗迷冥而不竭;永注禅河,涤樊笼而无尽。岂谓积善不祐,皇天何辜?	使长流法□,□幽冥而不竭;□□□□□□□□ 无尽。岂谓积善不祐,皇天何辜?	使长流法海,洗幽冥而不竭;永注禅河,涤樊笼而无尽。岂谓积善不祐,皇天何辜?	使长流法水,洗幽冥而不竭;永注禅河,涤烦笼而无尽。岂谓积善不祐,皇天何辜?